

近十年来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沈阳

(滨州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 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果,达成许多共识,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宏大叙事的趋向和粗线条、高度概括性的特点;以后的研究可以借鉴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重视具体的、个案式的研究,注重拓宽史料,注重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

[关键词] 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经济

[中图分类号] K9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2-0038-(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政府、国务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学术界也对黄河三角洲展开研究,先后出版了《黄河三角洲古文化遗存研究》、《遗忘的绿荫——李广田论》、《魏氏庄园研究》、《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黄河三角洲古风物诗整理研究》、《先忧后乐范仲淹》、《黄河三角洲民间美术研究》、《黄河三角洲民间音乐研究》、《黄河三角洲佛教造像研究》、《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黄河三角洲方言研究》等2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这些成果中,涉及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的占大多数。本文拟结合相关论著的内容,对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和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文化

研究黄河三角洲必须明确黄河三角洲的涵义。根据学术界通行的看法,黄河三角洲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动态的,有古代、近代和现代之分^{[1]2-3}。从现实的角度讲,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是指山东滨州和东营两市以及淄博的高青县^[2],而文化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则指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及其周边地区^{[1]5}。对黄河三角洲概念不同涵义的辨别为今天研究黄河三角洲区域做了重要铺垫。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和建设纳入议事日程之后,

研究者较早对黄河三角洲文化进行论述,包括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渊源、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等问题。在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阶段上,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是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张金路认为黄河三角洲地区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至清末、近现代时期。有四个特征较为突出:务实性、抗争性、多元化、封闭性^[3]。郑杰文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经过孕育形成时期(西周之前)、交流融会时期(周秦至宋元)和开发兴盛时期(明清以降)^[4]。四阶段说以孙才顺为代表,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属于当地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经历从远古到商周之际、西周及春秋战国、秦汉至唐宋、元明清时期四个阶段,有着丰富多彩的内涵,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5]。

确定了文化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区域和发展阶段,研究者还总结出黄河三角洲文化凸显的风貌。孙才顺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源远流长,其产生的时限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三代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灵活务实是其基本的特征,并对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6]。张金路研究了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的特征,概括出灵活务实、尊儒隆礼、率直守信、追逐时尚的特点,进而提出开发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的一些建议^[7]。郑杰文总结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三个特征: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较强的接受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和坚韧宽容的人文性特点^[4]。其中的包容性又可以

[收稿日期] 2009-02-23

[作者简介] 李沈阳(1976-),男,山东平度人,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

作具体的分析,吴立岩、徐西国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包括对流域文化与海岸文化的包容、对古齐鲁文化的包容、对“草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包容、对老区革命文化的包容、对油地军校艰苦创业文化的包容。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和谐的群体主义精神^[8]。

当然,文化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与地理意义上的类似,在历史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张献青认为,研究黄河三角洲文化应该区分文化型态与文化类别,重视文化场域与文化资本,把握文化转型与文化交往,要搞清文化研究本体的有关内容,利用几种较实用的文化研究技术以求推动此项研究的发展^[9]。从历史上看,黄河三角洲文化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同其他文化因素的交融和碰撞,其内涵非常广泛。田家怡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流域文化、中原文化、海域文化、齐文化和土著文化^[10]。在这几种文化因素中,齐文化对黄河三角洲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杨玉珍认为,“黄河—齐文化—黄河三角洲有着密切的渊源和推动关系”,齐国建国修政经验的核心是富民兴邦,这对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1]。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儒学的影响。赵惠民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不仅有地域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厚重的儒学文化底蕴:孝道、仁德、和谐构成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基调与人文主线^[12]。

从上述成果中可以看出,在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探讨的:一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阶段,无论三阶段说还是四阶段说,都是以王朝兴替为上下限的;二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特征,如包容性、地域文化等;三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齐文化、土著文化、中原文化等有着复杂的关系,因此其具体内涵也是复杂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黄河三角洲文化,为以后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借鉴和批评的框架。

二、移民

移民是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移民的时期,李靖莉、闫永利认为自明初以来的600年间,黄河三角洲出现了三次移民迁入大潮——洪武、永乐年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浓重的移民文化烙印^[13]。实际上,近代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地区也存在广泛的移民现象^[14],民国时期的移民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和抗战时期的垦区,建国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有

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有六次,以垦利县为主^[15]。

对于移民的籍贯,李靖莉认为黄河三角洲移民的主体是山西人^[16],另外就是河北人。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经由枣强中转后分发来的,另一部分是移入河北的外来移民因各种原因自发地由枣强迁移而来,这部分人的籍属难以确定^[17]。再有就是一些流浪在外的山东人在移民潮中返回黄河三角洲,他们属于“流民复业”,即以前因各种原因流亡他省,而今重新回到家乡,他们与移民无多大差异,容易混淆^[18]。

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呈现出一些特点。李靖莉认为均衡天下人口与躲避天灾,导致移民举动既呈阶段性集中,又呈持续性延散;转迁后移入,使移民史实见诸方志和民间资料,不见于正史记载;移民形式以政府强制性安置为主,同时间杂着小股自发性无序移民;移民成分比较单一,以贫民为主,属于单纯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19]。赵惠民梳理了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移民的史实,揭示出当时移民值得关注的地方:移民主体为生存型移民、绅士在移民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移民返迁率比较高^[20]。李靖莉还分析了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移民,认为呈现一些明显的特点:移民类型单一;移民对象与安置区域相对集中;移民流动区域较小;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两种形式并存;移民持续时间长^[21]。需要注意的是,移民往往不是从山西直接进入黄河三角洲,而是采取转迁的形式,先是集中在鲁西北的东昌府,后来又转迁至黄河三角洲^[22]。此外,李靖莉、孙远方、宋平以黄河三角洲地区沾化县东部的马营诸村为例,揭示黄河三角洲移民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一是移民原因以政府行为为主,个人行为为辅;二是移民时间集中于1935—1937年之间;三是移民源出地既分散,又相对集中;四是移民种类比较单纯,少部分属行将退伍的军人,大部分为逃难的灾民;五是移民动机比较单一;六是……大区域的灾民在一个小区域内的分散组合特点,故而姓氏也极复杂;七是各地移民长期杂居共处,在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同时,也形成了由各种乡土文化融汇而成的多元性的移民文化。”^[23]

移民的加入给黄河三角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李靖莉认为,黄河三角洲的“地名印记着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在民间传说中,透露着黄河三角洲移民对先祖来路的模糊记忆”,“黄河三角洲人的生理特征与行为习惯等带着明显的移民印记,透露着移民旅途的辛酸”,“黄河三角洲的民间习俗,如新

娘拜堂、以水喻福、以梨喻离、春节燃火堆放鞭炮等,均与晋南民俗如出一辙”,“黄河三角洲人浓重的槐树情结中蕴涵着深深的怀乡念祖情愫”^[24]。

看来,在黄河三角洲的移民问题上,研究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黄河三角洲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明初、清末和民国以来三个时期,民国以后的移民又包括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移民、抗日根据地组织的移民和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政府组织的移民;二是移民的主体是山西人,另外就是部分河北人和返回黄河三角洲的山东人;三是不同时期的移民性质有所不同,既要分辨是政府组织的还是个人自发的,又要区别开生存型和发展型的移民。

三、经济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古代经济状况是近来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与文化研究一样,研究者也把黄河三角洲古代经济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李靖莉与李淑芬以时间为线索,从史前、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几个阶段简要叙述了黄河三角洲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情况,认为农业种类齐全而为唐宋朝廷所倚重,手工业以发达的制盐业、冶铁业、纺织业而著称,市场繁荣,商品交易昌盛^[25]。这种分期法也体现在盐业史的研究中,李靖莉等把黄河三角洲食盐的生产追溯到西周时期,进而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概述黄河三角洲古代盐业的发展历程,认为黄河三角洲古代盐业发展水平比较高,而行业作用、比较优越的自然环境、政府适宜的宏观举措都对这一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6]。

在经济分期的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探讨了各个阶段黄河三角洲的经济水平。赵惠民分析了古代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与地位,认为“地理环境与物产具有比较优势,加上政府适宜的宏观调控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黄河三角洲古代商贸活动比较兴盛,商品经济的发育在山东乃至全国处于较高水平,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27]。李靖莉考论了黄河三角洲古代工商业的概况,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濒海临水的区位优势,使黄河三角洲自古即有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其中,制盐业与纺织业为黄河三角洲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产品为历代朝廷所倚重。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的商业活动延至明清仍久盛不衰,繁荣昌盛^[28]。她还以制盐、纺织和草绳业为例,描述了晚清黄河三角洲手工业的发展轨迹,认为这一地区的手工业虽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在“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富国强民作用”^[29]。例如,在近代黄河

三角洲的棉业改良问题上,黄河三角洲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棉花品种科学改良试验基地,成功选育出脱字47号、36号、57号等美棉良种与齐东4号等种棉良种,并进行了一系列棉花栽培试验。黄河三角洲近代棉业改良不仅对黄河三角洲,而且对山东乃至全国棉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打造并愈益彰显了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特色与地位,二是进一步巩固了山东植棉大省的地位,三是引领、带动了全国植棉业的发展^[30]。

应当指出的是,黄河三角洲古代经济的发展也存在弱点。李靖莉研究了黄河三角洲古代的商业状况,认为这一地区的古代商业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发展程度偏低、发展区域不均衡,因此从总体上看,“黄河三角洲商业贸易始终没有摆脱地方化与封闭性的特点,属于封建小农经济范畴内的余缺调剂性质”^[31]。虽然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物产资源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发展区域不够均衡、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弱点^[32]。这些分析说明研究者对黄河三角洲的区域经济有着客观的认识。

因此,在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以王朝兴替为标志,围绕着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行了探讨,既关注到黄河三角洲的两大优势产业——制盐业和纺织业,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做出合理的评价,又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

四、反思与展望

在前面三部分内容中,笔者依次回顾了黄河三角洲近十年来的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观照到每个方面不同观点的同时,对他们能够达成的共识作出总结,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一是研究的时段集中在清代以后,对于清代之前黄河三角洲的状况关注的比较少,有的话也往往以“古代”或者朝代名称冠之,因此无法从中了解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二是研究的资料主要是运用清代地方志,偶尔涉及正史,这从已经发表的成果的注解和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无需赘言。三是研究的结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如对文化发展和经济变迁阶段的划分,区域特点的总结等。四是研究的成果侧重学术探讨,很少涉及黄河三角洲区域的开发与建设方面,这正是现实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特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侧重于宏大叙事,侧重宏观的、粗线条式的研究,相对缺

乏个案的、具体的研究。

杨洪章曾对如何进一步研究黄河三角洲文化提出一些概括性的建议^[33],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

第一,研究的时段可以向前推移,主要是从明清向前推移。黄河三角洲是处在历史变迁中的,不仅要研究离它较近时代的情况,也要关注更远的过去。如在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三角洲的河道迁徙、风俗人情、物产土产是怎样的,现在还没有大致的轮廓。因此郑杰文提出整理秦汉以降黄河三角洲各政区的地理沿革、政区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文献资料的构想^[34]。

第二,拓宽史料的来源,除了正史和清代地方志之外,其他史料,诸如碑刻、传说、族谱、文书等都可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还包括段剑秋、张献青辑录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民谚等^[35]。上文提到的吴名岗的论文就利用惠民县石庙镇庵里吴村出土的《吴铭墓志铭》,提出明初移民中的流民复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以前明初移民研究中的不足,有助于人们厘清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的真实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这类资料的过程中,族谱、传说往往是个人或族群记忆历史的载体,而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反映。移民史上很多省份的人声称自己是山西洪洞人的后裔,而且有族谱为证,但赵世瑜通过检讨明清地方志和家谱,发现大槐树移民之事大量存在于民间传说与族谱之中,而在民国,甚至晚清以前的地方史正史中比较少见,即使国内目前现存最早的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也没有提到移民问题,因此认为这些传说与其记录了明初移民的历史,毋宁是对祖先历史的记忆和对生活境遇的反映^[36]。这个例子提醒研究者在拓宽研究史料的同时,必须增强辨析史料的能力。

第三,注重黄河三角洲区域史的内在发展脉络。陈春声认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37]。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文化、移民还是经济上的分期,基本以王朝的兴替作为外在的标准,这也是学术界目前广泛采用的做法,问题在于,如果以此作为唯一的标准,就会忽略文化变迁、经济发展的内在脉络。有研究者曾区别了古代和近代黄河三角洲的手工业情况,认为传统的生产模式铸就了产品的自产自销,极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黄河三角洲手工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迫使其在竞争的压力下走出原来的生产模式,自给性质日趋

淡薄,商品化倾向愈益浓厚,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38]。这个论断暗含的命题是: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性质。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处在发展中,手工业的商品化是历史的趋势,这是研究者证明的。鸦片战争对黄河三角洲手工业的商品化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即如何处理内在发展与外部刺激两者之间的分量,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化上的研究也是如此。以朝代兴替作为划分文化发展阶段的上下限是否合适?文化的发展变化不同于政治革命,后者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前者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的变迁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陷入类似于“政治话语”的困境,除了以朝代兴替为标志外,还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标准。这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3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研究者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宏大叙事的趋向和粗线条、高度概括性的特点,因此在此后的研究中可以借鉴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重视具体的、个案式的研究,注重碑刻、传说、族谱、文书等正史和地方志之外的史料,重视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同行之间形成对话的平台,研究成果才能更加引起其他研究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 张金路,孙才顺,田家怡.黄河三角洲文化概要[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2] 李靖莉,王萍.黄河三角洲盐业生产史考[M]//李象润,李靖莉.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128-138.
- [3] 张金路.黄河三角洲区域文化的渊源与特征[J].滨州师专学报,2000(3):5-9.
- [4] 郑杰文.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特征[N].光明日报,2007-01-05(9).
- [5] 孙才顺.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历史发展[J].理论学刊,2002(2):122-125.
- [6] 孙才顺.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刍议[J].滨州师专学报,2002(1):71-74.
- [7] 张金路.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开发研究[J].滨州师专学报,2004(3):1-4.
- [8] 吴立岩,徐西国.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包容性及其体现的

- 和谐精神[J]. 特区经济, 2005(3): 53-54.
- [9] 张献青. 黄河三角洲文化与文化研究刍议[J]. 滨州学院学报, 2005(1): 16-18.
- [10] 田家怡. 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概念及其历史文化渊源[J]. 滨州师专学报, 2001(1): 48-50.
- [11] 杨玉珍. 齐文化与黄河三角洲开发[J]. 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3, 9(1): 1-5.
- [12] 赵惠民. 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儒学文化[J]. 山东行政学院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4): 123-124.
- [13] 李靖莉, 闫永利. 黄河三角洲移民文化的多元魅力[N]. 光明日报, 2007-01-19(9).
- [14] 董龙凯. 1855—1874年黄河漫流与山东人口迁移[J]. 文史哲, 1998(3): 61-69.
- [15] 孙远方, 李靖莉, 宋平. 民国以来黄河三角洲移民概览[J]. 滨州师专学报, 2002(1): 81-83.
- [16] 李靖莉. 明初移民对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渗透影响[J]. 理论学刊, 2006(11): 107-109.
- [17] 李靖莉, 孙远方, 宋平. 黄河三角洲枣强移民考源[J].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1(4): 50-53.
- [18] 吴名岗. 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中的流民复业问题[J]. 滨州学院学报, 2008(2): 18-21.
- [19] 李靖莉. 黄河三角洲山西移民的特点[J]. 文史哲, 2003(1): 151-155.
- [20] 赵惠民. 清末民初的黄河三角洲移民[J]. 齐鲁学刊, 2007(4): 53-57.
- [21] 李靖莉.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4): 72-74.
- [22] 李靖莉, 孙远方, 宋平. 黄河三角洲洪洞移民考[J]. 东方论坛, 2004(2): 50-54.
- [23] 李靖莉, 孙远方, 宋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三角洲移民与马营诸村的建立[J]. 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18(4): 62-65.
- [24] 李靖莉. 黄河三角洲移民文化的特点[J]. 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1(3): 51-53.
- [25] 李靖莉, 李淑芬. 黄河三角洲古代经济述要[J]. 山东行政学院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2): 122-124.
- [26] 李靖莉, 赵惠民. 黄河三角洲古代盐业考论[J]. 山东社会科学, 2007(9): 108-111.
- [27] 赵惠民. 论黄河三角洲古代商品经济的发育[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3(3): 34-36.
- [28] 李靖莉. 黄河三角洲古代工商业考略[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39-42.
- [29] 李靖莉. 晚清时期黄河三角洲手工业考论[J]. 滨州学院学报, 2008(2): 12-17.
- [30] 李靖莉. 黄河三角洲近代棉业改良及其影响[J]. 齐鲁学刊, 2005(6): 56-59.
- [31] 李靖莉. 黄河三角洲古代商业考论[J]. 滨州学院学报, 2005(1): 12-15.
- [32] 李靖莉. 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考论[J]. 东岳论丛, 2006(6): 178-180.
- [33] 杨洪章.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N]. 光明日报, 2007-04-20(9).
- [34] 郑杰文. 黄河三角洲传统文化研究概说[M]//滨州师专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 黄河三角洲文化战略研究. 济南: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1: 215-222.
- [35] 段剑秋, 张献青. 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 13.
- [36] 赵世瑜.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J]. 历史研究, 2006(1): 49-64.
- [37] 陈春声. 走向历史现场[J]. 读书, 2006(9): 19-28.
- [38] 李靖莉. 黄河三角洲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J]. 东岳论丛, 2003(2): 106-108.

[责任编辑: 陈可阔]

A Review on Articles and Books about the Yellow River Delta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LI Shen-yang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3, China)

Abstract: Larg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culture, immigrat and economy about the Yellow River Delta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and many common views reached, which provide the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the tendency of grand narrat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ough outline and high generalization. In future study, use will be made of the methods of area society history, attention paid to concrete ca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ada broadened and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nner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Delta; Culture; Immigrant; Economy